

“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”

——对话作家魏思孝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

2023年最后一个月,作家魏思孝两次来青岛,一次是好友郑在欢小说集《雪春秋》签售会,一次是自己的第5部长篇小说《沈颖与陈子凯》分享会。

对于魏思孝来说,来青岛是故地重游。2009年,他在青岛与郑在欢第一次相遇,他的小说里也会出现嫩江路等青岛街道。2023年,魏思孝在小说界迅速升起,他所在的淄博也在2023年爆红,意外让他代言这座城市——12月20日,魏思孝代表淄博领取了《新周刊》“2023中国年度新锐榜·年度城市”奖。

“85后”罕有乡村题材作家,魏思孝为文坛所珍视的是他一直身处农村生活现场,同时谙熟现代小说的技法,面对个中荒诞和误解又能保持动态的清醒。近年来,魏思孝的创作进入高产期,自2019年起相继推出《余事勿取》《都是人民群众》《王能好》三部乡村题材小说,为文学贡献了鲁中地区“辛留村”角色群像。他的长篇小说《王能好》入围宝珀文学奖决选名单,为汉语言文学贡献了一个多话、狡黠、孤独、精神胜利的村民形象。新作《沈颖与陈子凯》把视线转向城市生活,在一个“雇佣杀人”的故事里,两个人面对爱情无处安放只好拿起来当凶器。

魏思孝的生活细节正在被高频次的访谈详细展开:他名字的由来、母亲“老许”的乡村生活、小说发表后向故事原型支付“版权费”……编辑说,获得文学奖之后,也有朋友向魏思孝借钱了。魏思孝对话题不设防——奇特的是,越是敞开,越是加深了他的神秘感和写作的自由维度。乍一看,他的创作之路没有秘诀:在乡村里坚持十几年,离要写的人很近,在清贫里跟他们一起熬下去,保持一种在上升通道里的下坠潜意识。写作者知道魏思孝是对的,写作者绕开了之后,还是觉得魏思孝是对的。

法学教授罗翔这么评价《王能好》:“在这本书上,我看到了一个放大的闰土,一个放大的阿Q,进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。”文学让人严肃地看见自己,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的“不及物”,会传导至一个个“王能好”身上,变得“及物”,形而下,暴露出带有体温的真实。正如魏思孝屡次引用的丹尼尔·约翰逊所言:“在写作中,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。”

身边人

记者:您为什么对乡村故事、乡村题材感兴趣?乡村打动您的地方在哪里?

魏思孝:就小说人物来说,我觉得农村生活当中有非常不体面的一面。不体面之外,农村人的生存有非常多的艰辛和心酸,每张脸都饱受生活的煎熬,皱褶、黝黑,这是几十年劳作的结果,是生活中各种不如意的碾压。城市生活中体面人脸上看不到这些内容,乡村生活中一张张脸非常有文学性,你特别想知道这张脸背后的家族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恰好我在村庄里,通过个人方式,多多少少知道这张脸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。

不是说城市生活中的每张脸不值得被记录——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和不如意。只是说以我现在的状态,更适合乡村这种书写。乡村作为熟人社会有固定的运行规则,生活交集更加密切,描写一个人的话会延伸出整个家族。我还没找到适合的方式去书写城市,城市生活关系比较松散,大家靠工作维系或者靠朋友关系维系,这种维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同事之间还可能有竞争关系,朋友过几年换一拨。我拿不准如何书写当下城市,不是城市不值得,而是我的生活经验对乡村有更多的表达和挖掘空间。

记者:在乡村生活中,您是一位作家,同时又是儿子、发小、同学等多重身份,维持这些身份是不是特别有戏剧性?

魏思孝:我和母亲之间就是非常简单的农村母子相处方式。我写作这个身份在母亲看来没有什么特殊,只不过其他人是打工进工厂赚钱生活,我是靠写字赚钱养家。我们从不讨论文学,她也不看书,不看朋友圈。我说:“我书里写了你,你不看看?”她说:“我才不看,你爱写什么写什么。”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:她在农村习惯了,不愿意去城市生活。我每周都回到村里看看她,也没有什么正常的沟通。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她不认为重要,有时候你状态不好,她觉得你有吃有喝就行了,什么状态好不好、有什么情绪不重要。她身上有中国农民既朴素又坚韧的生命力,她没有考虑那么多,过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。

我的小说发小看了,没有太多的表示。亲朋好友不读小说,也不会谈论这些问题。他们确实是疏于阅读,没有那么多的表达欲。我的小说和原型人物没有直接的接触,即使他们读了之后也不会有太多的反馈。

记者:您好像从生活中储存了特别多的细节,从抓细节到把细节写入小说里,这其中是个什么过程?

魏思孝:作家这个职业很特殊,你看他每天写或者不写,每天的生活就是积累素材,不能说他工作。至于人生经历什么时候能转化成小说,这个时间不好把控。可能昨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文学性,你今天就写出来了;也可能10年前的事情10年后突然想起来,会放入小说中,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。

记者:作家体验与读者体验不一样,可能作为作者您更喜欢《余事勿取》,而读者更喜欢《王能好》。您怎么看待“专业读者”与“普通读者”对同一本书的不同评价?

魏思孝:我的5部长篇小说里,最早的《不明物》和《我们为什么无聊》都是青春期的小说,在文学上是不合格的。真正进入长篇写作是通过《余事勿取》和《王能好》。从作品上,我的写作能力在提高。但是,具体到写作中,我完全没有越写越顺手的情况,还是能感受到困难。毕竟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,没有轻松可言,每天的写作还是自我怀疑的状态,想把脑海中最好的东西写出来很困难。

作家不可能重复自己,肯定希望下一部小说有创新。不管写了多少年,我总是觉得进入下一次写作时照样很困难,不存在熟能生巧。书法家形成书写风格后,可以同一个笔法写很多个条幅。可是,小说不可能批量生产,就可复制性来说,小说有困境在里面。

魏思孝,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,小说家,2018年入选张炜工作室高级班学员。出版有“乡村三部曲”《余事勿取》《都是人民群众》《王能好》等,近作《沈颖与陈子凯》。曾获第九届报喜鸟文学领域新锐艺术人物、山东文学新人奖、第四届泰山文艺奖,长篇小说《王能好》进入2022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。

人物小传



■作家魏思孝。 王雷 摄

核心观点

■不是说城市生活中的每张脸不值得被记录——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和不如意。只是说以我现在的状态,更适合乡村这种书写。乡村作为熟人社会有固定的运行规则,生活交集更加密切,描写一个人的话会延伸出整个家族。

■不管写了多少年,我总是觉得进入下一次写作时照样很困难,不存在熟能生巧。书法家形成书写风格后,可以同一个笔法写很多个条幅。可是,小说不可能批量生产,就可复制性来说,小说有困境在里面。

■我能看进去的喜欢的作家会反复读,偶尔翻到一页,读下去,寻找文字的状态。一个作家是写作者而不是搞批评研究的,不是所有作家都需要读,读你喜欢的就可以。

■一个作家有了固定审美之后,在后续写作中会结合生活和审美体验进行表达。作者都是从模仿开始,渐渐找到表达方式。

■我从来没有如此局限地看待一个作家群体,而且也很难仅从地域上对作家粗略划分。文学是关乎整个人类的。不论是横向,同时代的比较,还是纵向的,从历史的脉络上去梳理,都欠妥。

记者:您的乡村书写集中于“辛留村”里的诸多人物,这和福克纳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”的书写有对应吗?

魏思孝:其实这几年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《断青山》原著小说作者安妮·普鲁。我这几年反复看的一本书是她写的《手风琴罪案》(一台绿色手风琴的前后8位主人先后死于非命的故事),她写的是美国移民史,其中有法裔、德裔、墨西哥裔和非洲裔的移民故事,几个族群祖辈如何移民美国,如何扎根、繁衍,她笔下的城市化进程跟中国当下有相似之处。普鲁这位女作家在写作技巧方面、语言方面有特别可取的地方,如何描述细节、如何取舍人物,最打动我的就是她文学性的手法,特别受用。

记者:作家在某段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,您怎么完成取舍?

魏思孝:其实我是有阅读障碍的,不是什么小说都能看下去,要看自己的口味。像是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我看进去就不看了。我能看进去的喜欢的作家会反复读,偶尔翻到一页,读下去,寻找文字的状态。一个作家是写作者而不是搞批评研究的,不是所有作家都需要读,读你喜欢的就可以。

记者:您和作家郑在欢是好朋友,他的笔法特别简洁,而您的小说细节丰富,差异性其实很大。

魏思孝:我和他青年时期就认识,有共通的审美和品位。我们都喜欢韩东、曹寇、刘震云等作家。一个作家有了固定审美之后,在后续写作中会结合生活和审美体验进行表达。作者都是从模仿开始,渐渐找到表达方式,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
我和郑在欢第一次是在青岛相遇。2009年,我们参加了空中网的网络写作比赛,我们俩都是获奖者,获奖后就成为网友。郑在欢当时用手机写小说,他不会调整文字格式,我去网吧帮他调整,他觉得我比较靠谱,就从北京来青岛找我玩。我们当时是第一次网友见面,记得一起爬了信号山,不会拍照,照片拍出来都是虚的。

记者:评论家赵坤评价您特别“自律”,同时又习惯于“自我矮化”。这两个评价您认可吗?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?

魏思孝:作为朋友,她熟悉我平时在做些什么,没有人要求,但自己每天有固定的写作份额要完成,且一直笔耕不辍。大概晚上八九点钟,我对着电脑酝酿一个多小时,差不多11点开始写作,写到一两点钟,一天能写一两千字就算不错了。这是我对她描述的自己的生活,当然,她不知道我每天还有大量的时间在无所事事。

至于“自我矮化”,我只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,且不敢讳自嘲。或许作为评论家,她看到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内作家太多了,而她又并不觉得他们有多好吧。嗯,赵老师是一个头脑清醒的评论家。

自己人

记者:2022年,《王能好》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。这个奖项对于年轻作家非常重要,您怎么看待这段经历?

魏思孝:这是我第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这个奖。我很看重宝珀理想国文学奖,它是一个专业奖,我和评委完全不认识,也完全没有交集。入围之后,《王能好》被更多人读到,有利于这本书的传播。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对挖掘当下年轻人的创作很有价值,行内人都渴望得到它的认可,但是奖项有一定的随机性。可能这一届评委更喜欢现实题材小说,换一届评委对另外的题材感兴趣。《王能好》的确是依托这个奖项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,这足以说明这个奖项的影响力,以及我这个小小说还算不错。

读者和写作者面对文学作品的感受有不一致的地方。从写作者的身份来说,你觉得这个作家特别好、特别有启发,但是,恰恰他没有获得特别大的成功,没有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可。作为写作者,我们追求对文学的探索和理解,虽然渴望拥有读者群体,但不能强求。

记者:2023年文学界比较轰动的一件事,就是班宇、陈春成等年轻作家在武汉考取事业编制。您怎么看这件事?

魏思孝: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。这几年,无论是作家进入体制还是大学生毕业考编,实际上是时代的气息和氛围。我觉得不能用“追求生活的稳定”来严格要求作家,衡量作家只有一个标准:不管在体制内或者体制外,重要的是你能否写出更好的东西。如果你觉得在体制内有利于自己的创作,那你就进去。如果你觉得在体制外会写出好的作品,那你就出去。作家以作品为重,寻求匹配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。反观“50后”“60后”的资深作家,他们大部分有稳定的体制内收入,像余华、莫言等作家,外界不会给予苛刻非议,同样也没必要对年轻作家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那么多的要求。

记者:记得您先后谈过王小波等作家对您的影响。在您的访谈里可以看到大量小说家的名字,可以谈一下写作上的师承吗?

魏思孝:可以分享一下对我来说重要的阅读节点。2005年,在学校的盗版书摊上,我看到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。2006年,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到由杨黎编著的《灿烂》——有关第三代诗人的生活。2008年,我接触到乌青创办的果皮论坛,里面有关于橡皮文学网、他们文学网以及乌青做的《海岛》等电子书。2010年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2011年,乌青的《有一天》和曹寇的诗集。2016年,丹尼斯·约翰逊的《火车梦》。2018年,在理查德·福特编辑的《蓝领、白领、无领》这本书里读到了安妮·普鲁的《工作史》,由此认识到她,开始读她其余的书。

记者:看到您代表淄博领取了《新周刊》的“2023中国年度新锐榜·年度城市”奖。您对淄博这个城市、对山东作家这个属性怎么看?

魏思孝:我身上最重的山东属性就是安土重迁,没有在外面闯荡的欲望,还是想在淄博离着家乡和亲人近一点,比较恋家。说实在的,我对淄博的自豪感也是今年才有的。面对外来游客,当地人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善意,令我常有动容。至于其他方面,因亲友在这里,我当然是无法割舍的,而且没有因“好”“坏”而特殊对待,他们是鲜活的,即便是有缺陷和不足,也令我深感亲切。至于山东作家这个群体,我从来没有如此局限地看待一个作家群体,而且也很难仅从地域上对作家粗略划分。文学是关乎整个人类的。不论是横向,同时代的比较,还是纵向的,从历史的脉络上去梳理,都欠妥。

记者:批评家的凝视让您不安吗?

魏思孝:每次接受采访都是表达想法的机会。有些问题让我深入思考、梳理想法,每次采访都是发声的机会。一个作品出来后就不属于作者,批评家和读者有着自己的解读,可谓由作品衍生出来的作品。写作者被越多的人讨论,就越有在场感和存在感,毕竟我还没有达到塞林格这种隐士的境界。

记者:您的新作《土广寸木》即将出版,先睹为快的评论家一片叫好。您能介绍一下这本新书吗?新年出新书,您有没有新的愿景?

魏思孝:这部新长篇分成两部分,上半部分写一些场景,比如乡村酒局、老年人的生活、一个固定地点的变迁、春节村里发放福利等等,写乡村生活的众生相;下半部分偏向非虚构内容,从我和我母亲的生活入手,写了她一年四季的乡村生活是怎么度过的。

《土广寸木》计划2024年春天出版,要说我的新年愿景就是早日写完手头的新长篇。生活有些部分不在掌控之内,也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。当下社会靠写作维生的压力很大,不知道我的小说会有什么反响,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作为自由写作者,生存的焦虑还是一直存在的。